

在文化革命战线的前列

第 二 輯

——全国各地扫除文盲經驗介紹——



新 知 識 出 版 社

在文化革命战綫的前列

(第二輯)

——全国各地扫除文盲經驗介紹——

新 知 識 出 版 社

一九五八年·上海

在文化革命战綫的前列

(第二輯)

—全国各地掃除文盲經驗介紹—

*

新知識出版社編輯、出版

(上海湖南路9号)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015号

上海市印刷五厂印刷 新华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

*

开本：787×1092 1/32 印張：2 3/4 字數：56,000

1958年5月第1版 1958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數：1—25,000本

統一書号：7076·329

定 价：(6) 0.24元

前 言

随着全国社会主义大跃进和生产高潮的到来，全国的文化教育事业也跨进了社会主义大跃进的巨流。扫除文盲的运动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跃进，过去認為扫盲是非十年八年不能完成的，現在許多省都認為一年可以扫除；有些省已創造了无文盲县，更多的地方出現了文化乡。这些事实告訴我們：多、快、好、省的社会主义建設方針不仅在工农业生产中适用，在文化教育事业中也一样适用，而在扫盲运动中要实现这一方針，必須全党动员、全民办学；在文化革命战綫上，也应该相信群众自己是能解放自己的。

上述情况在本書所收集的各篇中都有具体事实作了說明，这些材料都是第四次全国教育行政會議上的經驗交流材料，也就是文化革命战綫上首先傳来的捷报；其中包括：在教育事业全面大跃进中創造文化县的河南省登封县、創造全国第一个无文盲县的黑龙江省宁安县和其他各地工厂、农村、山区、街道等不同地区、不同条件的扫盲工作經驗；我們認為：虽然扫盲运动的发展极其迅速，更多的捷报将如雪片飞来，更好的經驗将会被創造出来，但把这些已有的經驗介紹給广大的讀者，对当前正在大力开展的扫盲运动还是有幫助的。

在农村扫盲运动中根据“不忙多学、小忙少学、大忙放学”的原則来具体安排学习与生产，是在許多地区都已行之有效

的办法,但登封县的群众却提出了“农闲大学、农忙小学、大忙继续学”这一更积极的口号,这说明人民群众对文化科学知识渴望,正随着社会主义大跃进在不断提高和增长,也说明了群众的智慧和力量是无穷的。但本书所选辑的各地经验中也有根据其具体条件仍提“不忙多学、小忙少学、大忙放学”的口号,也获得了良好的成绩、创造了一定的经验;这不能认为就与登封县群众所提的口号有所矛盾,因为一个指导着行动的口号,总是根据客观形势和当时当地的具体条件提出来的,因此我们在本书中把在不同条件之下创造的经验兼收并蓄,也许可以给读者提供更多的参考材料。本书中所选的“西张耿乡的道路”一篇,全面介绍了该乡在办识字班的基础上创办业余文化技术学校的经验,似乎并不是着重介绍扫盲工作经验的,但因为业余文化技术学校是在巩固扫盲成绩的基础上办起来的,而且这个学校的发展又进一步推动了扫盲,所以我们仍把它编入“全国各地扫除文盲经验介绍”这一辑,这里附带说明一下。

編 者 1958年4月

目 录

打破扫盲工作中的右倾保守思想·····	1
登封县七个社又六个村和十四个生产队扫除文盲的 經驗·····	20
登封县 1958 年扫除全县文盲的规划 ·····	26
宁安县扫盲工作基本經驗初步总结·····	35
鼓足干劲,加快扫盲速度 ·····	50
西張耿乡的道路·····	59
福建省第一个文化乡——秀峰乡·····	67
一个基本上扫除文盲的街道·····	77

打破扫盲工作中的右傾保守思想

河南省登封县提前完成无文盲县的基本經驗

一

河南省登封县的扫盲工作任务是在第二个五年計劃第一年第一季度的第五天完成的，提前九年九个月零 26 天实现了全国农业发展綱要(草案)十年规划对扫盲工作的要求。这不是神話，而是在全面跃进的新形势下无数奇迹中的一个奇迹。这一鉄的事实不仅彻底解除了一部分同志对扫盲工作是否冒进的疑虑，而且在实践过程中也批判了形形色色的右傾保守思想。有人曾說扫盲工作是精神劳动，只能循序渐进，不能突击；只能采取比較正规的課堂教学方法，不能采用大规模的群众性的社会运动方式；只能分期分批地完成，不能象搞其他运动那样一气呵成。某些同志片面強調扫盲工作的重要性，要和农业生产挤时间来个平分秋色。有些同志則借口农业生产太忙，怕妨碍生产。此外还有人認為，登封这样落后的山区，要完成扫盲工作是非常困难的，要求領導上給以更长的时间和更大的支援，好象沒有这些条件，就无法按照一般的时间和一般的要求来完成任务似的，更不用說提前完成任务了。然而事实的发展却打破了常规，并在全面跃进中創造了光輝的成績。

登封是石厚土薄、岡巒起伏的山区。解放前，人民的經濟

文化生活是十分落后的。土改后，人民的經濟文化生活逐漸得到了改善，特別是在實現了農業合作化以後，糧食增產速度已經趕上和超過了當地富裕中農的生產水平（1957年全县亩產量平均315斤，富裕中農的亩產量是296斤）。生產大躍進加速了人民思想意識的變化，他們要求發揮主觀能動作用，更快地推動生產，這就是登封人民對改善文化生活狀況的要求日益迫切的根本原因。1956年時，青壯年文盲56,000多人在“合作化真正好，沒有文化辦不了；要想鞏固合作社，必須要把文盲掃”的响亮口號鼓舞下，風起雲湧地卷進了掃盲學習高潮，先後掃除了10,000多個文盲。但是，由於當時領導的思想落後於客觀存在，在聽到掃盲冒進的叫聲以後，對群眾若飢若渴的要求體會不深，因而對這一工作的支持就不夠有力，致使掃盲工作開展的規模和進行的速度都受到了一定的影響。在開展學習農業發展綱要（草案）的辯論中，才明確地提出：“提前實現四、五、八，必須有文化”、“社會主義是天堂，沒有文化不能上”等响亮口號。當我們虛心聽取了群眾的批評意見和合理化建議之後，縣委書記蔡振中同志，認真總結了七個社六個村十四個隊的掃盲經驗，提出“農閑大學，農忙小學，大忙複習鞏固”，認為這樣提法比較“農忙多學，小忙少學，大忙放學”的舊提法要積極些。當群眾提出“農閑大學，農忙小學，大忙繼續學”的口號時，我們即發現這樣的提法很恰當，因而把它很快地在全縣加以推廣，事實證明農民的體會是符合實際情況的。在高潮中的農業生產，任何時候都是熱火朝天的，無所謂“農閑”。這使我們在實踐過程中體驗到過去的掃盲口號不僅是不完善的，而且是不能適應當前客觀形勢的需要和

不能滿足群众对于提高文化的迫切要求的。在彻底糾正了領導上的右傾保守思想之后，在“千人教、万人学”、“万人教、全民学”的号召下，調动了 80,000 多青壯年男女文盲和与这一数字大体相当的人民教师、下放干部、县区乡干部、轉业軍人、历年参加生产的中小学毕业生投入扫盲运动。正在学校学习的中小學生、历次从扫盲班毕业的积极分子和社会知識分子，象潮水一样地卷进了苦学苦练的学习热潮和包教保学的教学高潮。两个高潮互相交熾、互相鼓舞、互相推动、一浪比一浪高，冲破了一切思想障碍，使我們在原来的扫盲工作基础上，经过四个月的突击，扫除了 68,516 名青壯年文盲，占青壯年文盲总数的 81.2%。在宣布无文盲县之后的十天中，又繼續扫除了 10,000 名文盲，并在全县范圍內迅速地普及了中小学教育。

二

我們为什么能够在短時間內采用群众运动的方式，把多年以来登封县未能完成的扫盲任务完成了呢？当然，几年来扫盲工作取得的成績（1955 年入学人数已达 56,000 人、1956 年一直坚持学习的仍然有 32,000 人）是應該肯定的。历次扫盲班毕业學員已有 10,000 多人，絕大多数的乡社干部摆脱了文盲状态，他們在工作、学习、政治思想認識方面都有較快的提高，而且都成了扫盲运动的組織者、領導者和学习带头人，这都是极为有利的条件。但是，由于領導上过去有較严重的右傾保守思想，而且对民校教学工作缺乏有效的組織領導。“循序漸进”的思想和工作方法仍然束縛着我們的思想和手脚，同

时民校教师的思想上和工作中也有問題，有的不安心教学，有的墨守成規；因此，扫盲工作进展很慢，教与学两方面的积极性都未能充分地調动起来。所有这些問題，不能說不是历年来扫盲工作时断时續和进展比較迟緩的重要原因。在上級党的领导和群众提出了比較尖銳的批評，以及县委書記蔡振忠同志亲自动手總結了七社六村十四队的成功經驗之后，我們接受了深刻的教訓，于是才大胆地采用大規模的、全民性群众运动的突击方式，在較短的时间內完成了这一历史任务。

我們在完成扫盲工作任务的过程中，除糾正了右傾保守思想和克服了許多右傾观点以外，在教学問題上主要是抓住了哪几个环节呢？

（一）通过調查研究，在进行查文盲、查教学力量的基础上，进行了充分的思想动員工作。1957年冬季，我們在全县范圍內以乡为单位，对文盲状况和教学力量作了排队摸底工作，弄清了全县青壮年中，尚有 80,000 多名文盲和半文盲，需要很快地扫除。在我們面前出現的新問題是依靠 4,000 多个民校教师能不能完成任务。当然，这些人是我們必須依靠的主要力量，但是几年的實踐証明：仅仅依靠他們是不能在短時間內完成这一艰巨的历史任务的。正当这个时候，我县二区根据当地的情况提出了“千人教、万人学”和“工业化靠工人，农业增产靠农民，文化革命交給識字人”的口号，这对县委领导是有很大启发的。这时已經对教学力量进行过普查，因此我們知道能够負責担任民校教师、負責担任包教保学的輔導員和小先生的潜力是很大的。这个力量包括下放干部、轉业軍人、从事农业生产的中小学毕业生、先后摆脱文盲状态的积极分子以

及社会上的知識分子，这些人的总数大体上相当于现有的文盲、半文盲的数字。这就說明：如果能够把所有的教学和包教力量都充分地動員起来，使他們自覺积极地投入扫盲运动，那末我們就有可能在短時間內完成这个任务。因此，我們才敢于提出具有巨大動員力量的“万人教、全民学”的行动口号。1957年12月，我們召开了包括区、乡、社干部、民校教师和扫盲积极分子在内的2000多人的誓师大会。在此之后，紧接着又在各个区、乡、社举行了包括干部、教师和群众共同参加的誓师大会，广泛地宣傳了当时的政治形势和任务、扫盲工作的重要性，彻底地批判了各种形式的右傾保守思想，提出了扫盲的任务和要求，树立了信心和决心；同时傳播了先进經驗，而且真正作到了家喻戶曉。后来，我們又通过以村或社为单位召开了訴文盲苦的群众大会，用群众和干部自己亲身受过的苦痛，教育了群众，教育了干部，也进一步教育了大部分缺少这种体会的民校教师。在十里鋪的訴苦大会上，42岁的杜勤修追述过去他曾向地主借过100元，不知道是冥洋，到巩县回廊鎮买东西，来回跑了120里路，起早摸黑，两头不見太阳，两头受到恶毒的責罵，43岁的杜鉄拴曾拿着伪保公所的信亲自送到补訓处被迫当了国民党的兵；干部还訴說土改后因不会算賬，互助組連垮四次以及用地主会計吃了亏的事。这些痛苦的教訓，感动了所有到会的人，也感动了民校教师。民师張桂荣當場发誓“不扫掉全乡文盲不結婚”，老民师施景荣宣誓說：“我要鼓足干劲，一直干到发白齿脫，在扫盲战綫上馬革裹尸，以报共产党的大恩千万一”。这些誓詞反过来又感动了民校學員和广大群众。于是造成了运动的声势。通过四带头——党员、团员、干

部及其家屬，帶動了絕大多數的青壯年文盲、半文盲自動報名入了學。但是那些孩子多、家務重的壯年婦女們雖然已經知道了學習文化的好處，只是因為受了“十年寒窗苦”、“人過三十不學藝”的思想影響，對掃盲仍然缺乏信心和決心；還有極少數的學生家長仍然受着“婦女不算人，刷鍋潑尿盆”的封建思想的束縛，怕姑娘、媳婦跑瘋了，不讓她們上學。因此，必須具體地了解並結合她們已往的生活、生產體驗和當前的實際需要，進行細致的思想動員工作。如過去對目前已經在高小學習的王芬（34歲的寡婦，有三個孩子和一個老婆母）進行思想動員，民校教師在第一次談話時就順便教他認了一個“王”字，第二次談話時教會了一個“芬”字，經過四五次談話，她又認識了隊長的名字，這時她才驚奇而高興地喊出“學文化就是這樣的？我有信心了！”由於打通了她的思想，所以就帶動了全鄉對學習缺乏信心和決心的壯年婦女。通過許多活生生的事實，教育了學生家長，改變了他們的認識。如井灣鄉的楊秋老先生就是高高兴兴地讓孫媳婦去上學的。後來，為了掀起更高的學習熱潮——苦學苦練的高潮，便由張副縣長主持組織了苦學模範對全縣進行廣播，並傳播了經驗；同時，很多黨、政領導人也都帶頭掃盲，徐副縣長帶民校課本下鄉，到哪裡講哪裡，縣委宣傳部徐副部長在鄉里還擔負着包教任務，區委梁書記自己教了一班學員。這樣一來，運動的規模就愈來愈大，參加運動的人也就愈來愈廣泛了，這時連覺悟較高的老年人也提出“不戴文盲帽子進棺材”的口號，而投入了掃盲運動。我們通過提前完成掃盲任務的先進鄉、社、隊的慶祝大會，造成了“掃盲光榮”的輿論，使浪潮愈推愈高，不僅沖破了“二年完成”、“一年

完成”的规划,而且在先后传达了毛主席的十七条指示和六十条指示之后尚未来得及改变规划的时候,就很快地实现了无文盲县。这是連我們也沒有预料到的奇迹。

(二) 搞好教学組織工作和研究工作。过去的教学队伍只有民校教师,力量很小。在教学方法上一直是采用通常的教学法,“循序渐进”,因而收效較慢,在教学时不容易很密切地結合当前的中心工作,也不容易适应全面大跃进的需要。同时教材数量很少,不可能人手一册,除学习較能钻、接受能力較快的少数学员在2——3年內(有的時間更长些)达到了扫盲毕业标准以外,大部分人对“年年办冬学、年年从头学,一天三个字,那有功夫磨”的教学方法沒有信心,而且产生了反感甚至成了动员他們入学的思想障碍。領導上不接受这个教訓,就不能前进。

在发动了“万人教”的广大教学队伍后,如何把教学工作組織好和領導好,是一个嶄新的和极为重要的問題。我們的办法是在乡支部领导下,由乡扫盲协会把教学組織工作和領導工作統一地抓起来,設立教学研究室,統一教学进度和統一备課時間。在教学工作中互相帮助、互相觀摩、五天或一星期进行一次檢查評比,交流經驗,共同提高;同时根据地区情况,在一个区的範圍內設若干傳授站,在县扫盲办公室的統一领导下,及时总结先进經驗并及时組織參觀加以推广。包教保学队伍則由乡扫盲协会統一領導、統一分配包教对象。为了指导方便,把他們划分在两个指揮部下面进行活动:学校負責組織領導在校学习的中小學生;专职民校教师和下放干部共同負責組織、領導轉业軍人、农村知識分子和扫盲班毕业的积极分子

等。此外还在群众中提倡識百字者作“百字先生”、識十字者作“十字先生”，按时布置任务，訂立三包合同（对象、時間、任务）和三角合同（包者、被包者、生产队长）及时汇报、檢查，并对包教队伍及时訓練提高。事实証明，这些方法起了很大作用，特别是开展了互教互学运动之后，收效更快。如唐庄区在文盲、半文盲中进行父子互学、母子互学、兄弟互学、姐妹互学、妯娌互学、夫妻互学、會計、队长互学的就有 5,354 人，占該区 1958 年 2 月已达扫盲毕业标准的 8,877 人的 60.3%。这一事实也說明群众愿意而且能够自己解放自己。

（三）充分地發揮了教学智慧，改进了教学方法。我們知道，人們的智慧都是从摸索中逐步提高的，特别是在开展竞赛和进行評比时，由于参加竞赛的人高度地發揮了工作积极性，这种智慧也就更加易于發揮，并以更快的速度推动事物前进。我县扫盲工作进展較快的原因之一，就是由于在教学和学习两方面都开展了热火朝天的竞赛运动，教师在教学方法上的改进和学生的苦学苦练精神，有效地推动了扫盲工作并縮短了扫盲時間，这也是出乎我們預料的。现在仅将在扫盲实践过程中摸索到的几种教学方法介紹如下：

1. 同音字教学法：这个方法是民校教师梁澤民、安臣义两同志在教学过程中創造出来的。它的好处是：1. 教学内容通俗，适合群众的要求；2. 密切結合生产运动和中心工作；3. 符合速成和联系实际的教學方針的要求；4. 便于教学；5. 便于記憶、便于运用。如他們編成的速成識字課本第二課“怎样学习”的課文是“学习并不难，五到要記全，耳听手写嘴常念，心記眼看要苦练。”課文容易讀、容易懂、容易記。在“学”字下面

注上“学校”“学习”；在“习”字下面列举同音字“息”、“熄”、“洗”、“惜”；又在这几个字的后面写出“习惯”、“休息”、“熄灭”、“洗脸”、“可惜”等辞，好教、好学、好记、好懂、好用。县扫盲办公室把此书印发全县，大力推广，对缩短教学时间和提前完成扫盲任务，都起了重大的推进作用。

2. 改进了的小单元教学法：采用旧的扫盲课本，根据课文上生字多少把课文内容相关连的三至五课编为一个单元，先突击生字，再讲课文（学员认了字就能够懂，可不再讲解），抽出时间反复练习和学会用辞、联句、写短文，学员兴趣高，因而也比过去采用通常教学法时收效较快。为了便于集中精力突击生字，一般是按以下分类法把生字分成十组（但也要灵活不能机械）：1. 易记易写组：如伙、伴、万、千等；2. 同旁组：如坊、墙、坯和江、河、海、洋等；3. 同部首组：如草、花、荚和雷、电、震等；4. 声旁标音组：如撞、架、依、薪等；5. 同形组：如色、邑、巴、包等；6. 同音组：如以、宜、意、艺、异等；7. 字意相连组：如首都北京、香蕉、葡萄等；8. 顺口溜组：如“封”是“两土加一寸”，“俭”是“一人立一人卧，还有二人对面坐，一家添两口，看这日子怎样过”；9. 好记难写组：如薜、铨、霉等；10. 难关组：对难写难记的字（如兽、项、殖等），就编成难关组放在最后突击，这样不仅不影响学习情绪，而且由于已经战胜九个关，对最后的一个难关更加有了胜利的信心。这个办法是范国欣教师在夏天农忙时创造出来的。采用这种方法后，一天就能教一节课，28天教完了一本书，学了624个生字，在测验时，一班27人中全部认会的有16人，认会550—580字的有八人，仅有三人由于孩子多等原因未能达到要求，其中最差的一个还认会

了423字。以后范学义、王振礼两个团员在不同的两班内，又采用了这个方法，在15天内教完了一本书，因此，进一步证明了这种教学方法是可以加快速度的。我們把这个經驗推广以后，便提高了教师与学生的信心，并在縮短扫盲工作時間上起了巨大的作用。

3. 小黑板教学法：采用这个方法的地方更显得生动活泼，家家都有小黑板（最多的一家有十块）。我們把正在学校学习的中小学生（包括业余学校的学员），按能力分配包教任务；先由老师在課堂上把这些学生教会，然后讓他們分別到承包对象家里，把这些字抄在小黑板上，进行包教，二至三日换一次新内容。在内容方面，有的是宣傳时事政策和中心工作；有的是表揚模范；有的是开展批評，这样便使扫盲工作成为推动文化学习和进行政治鼓动工作的最有力的工具。扫盲任务结束后，农民掌握了文字工具，运用的范围就更加广泛了。如背阴坡白天保为劝妻子学文化在使黑板上写：“爱兰好同志、有話听心里：民校学员对你有意见，学习文化不积极，整天光好走娘家，丢了生产忘学习，社会主义是天堂，沒有文化难上去，从今以后要改过，努力学习赶上去”。当馬有才扫盲毕业不繼續上民校时，他的儿子馬德坡就在黑板上提出：“叫父亲，听我言，学习文化談一談：扫盲你才毕了业，坐在家里書不看，如果再有半年整，你所学的都忘完。希你再把学来进，生产学习当模范。”他們都接受了批評又繼續入学了。白大兰总结小黑板教学法的好处說：“小黑板，真偉大，是个眼科好专家，带来許多好眼药，治好了我們瞪眼睛。”乡长王春祥总结說：“小黑板真正强，要求适宜，用的得当，目的明确，内容多样，便利群众，

提高思想。”該村仅有 1,113 人，由學員集体創作的順口溜已經有了 1,800 多首。扫盲工作结束后，又有 191 个老人編成三个班，每天坚持扫盲学习。这一方法已經在全县推广，我們認為，这是行之有效的教學法。

4. 兒童認字崗哨：这样的崗哨都設在村头，在小黑板上写几个字或提出簡單的問題，能够認会的、答对的才放过去，否則當場教会。当我随着省委楊珏書記、教育厅长到三官庙去訪問时，还受到两次盘問。題目是：你对扫盲有什么貢獻？四害都是什么？除了四害有啥好处？这对激发学习情緒和服务中心工作都起了很大的作用。邻县到登封馱煤的农民对識字崗哨的兒童說：“我的文盲帽子要叫你們帮我摘掉呢！”

5. 布置識字环境并根据各个时期的生产任务和中心工作的要求編写补充教材。把生产环境和日常生活中最容易接近的事物、用具都标上名字，不仅可以收到象“看图識字”一样的效果；而且还可以进行强有力的政治教育工作。如以粮食問題为中心在农村中开展社会主义大辯論时，教师編写的补充教材是：“右派右派，心腸太坏，想搞垮共产党，想叫我們当牛羊。咱們大家一条心，打垮右派狠心狠”、“刘积学真坏蛋，凭空无故造謠言，穷占富光，富占天光是胡說，坚决打垮刘积学。”學員中的团员凌林修，范大庫等一天晚上就写了 29 篇声討右派的稿件（報紙上登了 12 篇），有力地推动了农村的大鳴大放、大爭大辯和反右斗爭。在辯論猪飼料問題时，教师又編写了“猪飼料，样样全，不用粮食不用錢，积存野菜杂树叶，猪儿吃得滾滾圓”，因而发动了群众采集猪飼料的积极性，推动了养猪事业。